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资助出版
北京市大学生城市文化教育基地

中国现代教育 思想史十论

孙希磊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资助出版
北京市大学生城市文化教育基地

中国现代教育 思想史十论

孙希磊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现代教育思想史十论 / 孙希磊著. —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 - 7 - 5656 - 0834 - 6

I. ①中… II. ①孙… III. ①教育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G40 - 092.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43832 号

ZHONGGUO XIANDAI JIAOYU SIXIANGSHI SHILUN

中国现代教育思想史十论

孙希磊 著

责任编辑 丁晓山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 (总编室) 68982468 (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321 千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学术著作 出版基金委员会

主 任：郑文堂

副主任：朱 光 宋国华

委 员：张大玉 吴海燕 陈静勇

吴 徽 李德英 陈志新

何佰洲 王晏民 陈宝江

刘临安 高春花 崔景安

目录

第一章 培育新民：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1
一、“中国之衰弱，由于教之未善也”：教育救国思想	1
二、“知其为制造国民之具”：教育性质与宗旨	17
三、“苟欲兴学，则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强行小学始”：教育体制与学校制度	36
四、“学以致用”与“术以明学”：学校的培养目标	39
五、“知识”、“情感”、“意志”的和谐融合：教育途径与方法	41
第二章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48
一、教育的宗旨和方针	48
二、世界观与人生观教育	55
三、涵养感情 美化人生：美育教育	59
四、大学教育思想	74
第三章 折衷新旧，贯通东西：胡适的教育思想	98
一、继承精粹，古为今用	99
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吸收与借鉴	103
三、留学的使命：携来甘露，遍洒神州	109
四、实用主义教育观念	114
五、大学者：“又开风气又为师”	121
第四章 “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蒋梦麟的教育思想	141
一、以教育救国为己任，追求“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的教育理想	142
二、强调科学精神与人的解放为核心的教育理念	155

三、北大精神的传承者，大学理念的“实干家”	160
第五章 学术标准与文化使命：罗家伦的教育思想	167
一、主政清华：由“学堂”到“大学”	167
二、大学的使命：“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	172
三、“人生、道德、责任”为核心的教育救国思想	181
第六章 “国失师表”：傅斯年的教育思想	191
一、毕生献身教育事业	192
二、批判封建教育观念	202
三、教育改革思想	208
四、大学教育理念	212
五、“国失师表”：傅斯年教育思想评价	216
第七章 “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梅贻琦的教育思想	219
一、毕生贡献于近代教育，鞠躬尽瘁于水木清华	219
二、融合中西教育理念，阐发现代大学精神	230
三、俭、宽、实的人格魅力	234
第八章 “位育”教育观：潘光旦的教育思想	237
一、基于“社会位育”观为核心的教育思想——达到“以群则和， 以独则足”的理想	237
二、“全人格”教育思想之精髓涵义	239
三、“通识教育”的大学教育理念	241
第九章 “允公允能”：张伯苓的教育思想	244
一、教育救国思想	244
二、教育目的和培养方针	248
三、“德、智、体、美”四育并重的教育举措	251
第十章 “求是”精神：竺可桢的教育思想	254
一、“东方剑桥”的教育改革	255
二、倡导“求是”的大学精神	264
三、现代大学教育理念	267

附录一	中国近代最早接受西式教育的一代风流人物 ——记晚清留美幼童的人生经历	273
附录二	西南联大与云南社会文化之发展	283
附录三	基督教与中国近代西医教育	294

第一章 培育新民：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梁启超（1873～1929），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既是政治家，也是学者和教育家。作为中国戊戌维新变法运动的领导者和宣传家，他大力呼吁立宪政体和民权思想，积极传播近代先进思想，针砭时弊，启蒙民众，被誉为“言论界的骄子”。与同时代风云人物不同的是，他一生始终关注教育，勤勉治学，心系于新民之说，情铸于育人之道。他孜孜以求的人生理想，就是通过培育人才，开启民智，陶冶人心，涵养民气，铸造现代国民之品格和公民之道德，以此作为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民主国家的必要基础，实现国家政治经济的繁荣和中华民族的复兴。综观其一生，他始终都在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奔走呼号，为实现“新民”的教育目标奋斗不息，为实现“知”、“情”、“意”的“三达德”教育理念呕心沥血。

如果按照中国传统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这一圆满人生的标准来衡量，那么，梁启超无疑是当之无愧的人！从“立言”方面看，梁启超文思敏捷，才华横溢，给后世留下无数闪烁着智慧与思想光芒的鸿篇巨著，而且“笔端常带感情”；从“立功”方面看，梁启超历经清末、民初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从“公车上书”到“百日维新”，从“立宪与革命之争”到“辛亥革命”，从“护国战争”到“护法之争”，他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处不留下他奔走忙碌的身影！最后，他实践了自己“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的人生格言，实现了一个伟大人生的最大价值。今天，他已经离开我们半个多世纪了！了解一下他那丰富多彩的教育人生，总结留给我们的那些精辟深邃的教育思想和理论，研究其教育思想的精粹和价值，会给我们很多启示与思考。

一、“中国之衰弱，由于教之未善也”：教育救国思想

教育缘于爱国，教育为了救国，这是梁启超教育救国思想的核心。教

育目标、宗旨、内容、方法、手段始终与国家存亡、民族兴衰、国民强弱紧密结合在一起，二者交织在一起，互动共生，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既是梁启超一生教育主张的出发点，也是他教育理想和实践目标的归宿点。教育推进变法，教育促进维新，二者相得益彰，也是梁启超教育救国思想的特征。主张以教育作为手段，开启民智，培育人才，为变法维新政治运动奠定思想的基础和人才保障，不仅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实现救亡图存的重要措施，也是解决民族危机，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最终之道。教育理想与救国方案的内在一致性，成为梁启超教育思想体系中一个重要方面。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以及主张、措施，绝不是脱离社会形势而孤立存在的单纯的主观理念。它是当时中国救亡图存的产物，是变法维新运动的需要，是民族危机险峻形势的刺激下，为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应运而生的必然抉择。一句话，教育，是为救中国，为改良中国，为了自立自强这一时代大目标服务。因此，梁启超把“开民智，育人才，兴学校，变科举”的思想观念放置在他的变法维新基本方略与改革措施中一个十分突出和显要的地位，这既是理解他教育救国思想的基本前提，也是贯穿其教育救国思想的“一条红线”与灵魂所在。

那么，梁启超关于“教育救国”的重要思想有哪些具体内容呢？它的社会背景、思想基础以及理论意义有哪些呢？它在梁启超的教育思想体系中占据着一个怎样的位置呢？

（一）梁启超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今文经学思想为其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强调“变通”的必然性和紧迫性，并借此进一步揭示自然界演变与人类社会更迭的规律

这不仅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变法维新政治主张奠定思想基础，而且，也为他提出教育救国的思想与主张铺垫了第一块“基石”。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主要表达了以下三个观点：一是指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无一不处在发展与变动之中。他说道，“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无一不是“彼生此灭”、“更迭迭变”、“累变而成”的客观物质世界；而且，这个过程是持续永恒的，“刻刻相续，一日千变”，“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今日所目为古法而守之者，其于古人之意，相去岂可以道里计哉！”。因此，他指出：“法者，天下之

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①。这一重要思想为构筑其系统的变法维新理论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是强调“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指出，既然“变”是“天下之公理”，则“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为也”。所以，尽管有人力图拒变固守，但终究阻断不了事物变化的趋势：“为不变之说者，动曰守古守古，庸詎知自太古、上古、中古、近古以至今日，固已不知万变千变。”三是强调人类社会进步与否，其衡量的标准，全在乎于“变”和“不变”之间作出不同的抉择与判断，其结果也完全不同，其兴衰成败在此一举。一方面，宇宙间“自然之变，天之道也，或变则善，或变则蔽”；另一方面，治理国家也是同样，如果“委心任远，听其流变，则日趋于蔽”。反之，如果“振刷整顿，斟酌通变，则日趋于善”。“流变”的结果，与“通变”截然不同。“流变”只能带来“因循不察，渐移渐变，百事废弛，卒至废蔽，不可收拾”的不幸后果，而“通变”则会取而代之，社会也会随之进步，“代兴者审其蔽而变之，斯为新王矣”。因此，他告诫人们说“苟其子孙达于此义，自审其蔽而变之，斯号中兴矣”^②。

以上思想是在向人们强调一个道理：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中兴”之道，就是应该审时度势，及时调整方略，适时变通自我。循“天下之公理”，变“天下之公器”，在变革中求生存，因变动而获民族文化之再生！如果墨守成规，只能坐以待毙而已。

（二）清王朝统治集团墨守成规与不思变革，是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重要内因，也是国家积贫积弱落伍于世界潮流的重要因素

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既是刺激中国改良派宣传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思想，呼吁变法维新主张的社会背景。同时，又是梁启超提出以“开民智，育人才，兴学校，废科举”为核心的教育救国思想的时代契机。

1840年以来的中国，遇到了“千百年所未曾有之大变局”。内忧与外患并存，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不断激化，国家与民族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历史关头。梁启超在《论不变之害》一文中分析了当时灾难深重的危险境况：

① 《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2008版，第1页。

② 《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2008版，第2页。

1. 列强威逼，虎视眈眈，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国家的不断侵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军事战争被动挨打，屡战屡败，丧失国土，沦陷家园；国家主权丧失侵夺，领土被蚕食分割；经济实力积贫积弱，城市变成“租界”，沿海成为列强争夺而划分的“势力范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庸。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文明的东方古国，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空前浩劫和悲惨境遇。大清帝国步入式微，逐步陷入黑暗的深渊。“夫欧洲诸国，势均力敌，欧洲以内，既无用武之地矣，然内力膨胀，郁勃磅礴而必求一泄，狭其民族帝国主义，日求灌而泄之他洲。我以膏腴沃壤，适当其中，于是万马齐足，万流汇力，一泄其尾闾于东亚大陆”^①。如何抵御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挽救民族危机，使国家转危为安？如何自强不息，振兴中华民族的力量，使国家走上富裕强盛之路？这是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的时代课题。

梁启超正是置身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便毅然肩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崇高使命。正如他所言，西方列强蠢蠢欲动，凭借其武力，强叩国门，登堂入室，明火执仗，企图吞噬古老的中国，“泰西各国，磨牙吮血，伺于吾旁者”^②。中国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古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面临着倾覆崩溃的危险：“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墁毁坏，榱栋崩析，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然而，让人感到心痛的是，身处其中的人却茫然不知所措：“室中之人”或“犹然酣嬉鼾卧，默然无所闻见”，或“睹其危险，惟知痛哭，束手待毙，不思拯救”，或“补且缺漏，弥缝蚁穴，苟安时日，以窥有功”^③。面临灾难深重的国家，采取什么方式、手段、措施挽救国家悲惨的命运，选择什么样的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救国方案才能推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尽快摆脱困境，并快速走上一条近代化的富国强兵的道路，这是梁启超思考与探索国家出路的一个出发点和归宿点。甲午战争的惨败及维新运动的勃兴，成为推动梁启超涉足政治活动的一个起点。

1894年2月，梁启超入京师，8月，中日战争爆发。军情危机，形势紧张，“迨中日战争起，北京风声鹤唳”，梁启超在京城结交名士贤达，议

① 《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2008版，第164页。

② 丁文江、赵丰田著：《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版，第7页。

③ 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版，第4页。



也！呜呼！甲午以来，一败再败，形见势拙，外人咸以无战斗力轻我矣”^①。

危机四伏的国情、忧国忧民的精神气质与爱国情怀，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梁启超毅然登上政治舞台，选择了救国救民的人生道路。奔走呼号，赴汤蹈火，宣传民权立宪思想，从事变法维新运动。

2. 国权沦丧，内忧深重，中国在贫弱落伍的逆境中苦苦挣扎

一是经济极端落后，工商业凋敝。即“工艺不兴，商务不讲”，洋货遍及全国各地，以至“土货日见减色，而他人投我所好，制造百货，畅销内地，脂膏将枯”。二是民智未开，人才匮乏，即“学校不立”。“学子于帖括外，一物不知；其上者考据辞章，破碎相尚，语与瀛海，瞠目不信，又得官甚难，治生无术，习于无耻，罔不知怪。”三是军队落伍，士兵素质低下，战斗力弱。即“兵学不讲”、“老弱癯烟”，平日欺压百姓，鱼肉乡里，战时拼凑募集“半属流丐”，武器落后，结果是“百战百败”。四是官制腐败，政体落后。即“官制不善”。所学的“辞章考据”“八股文”之类对治国理政毫无用处，造成“习非所用，用非所学”，因而，只得交给“胥吏”处理，故“百弊蠹起”。官僚机构“牵制推诿”、“鬻爵充塞”，“非钻营奔竞，不能疗饥，非贪污恶鄙，无以自给”^②。总之，中国的实际情况就是：国库枯竭、国力衰微、官僚腐败、民不聊生。对此，梁启超有这样的描述：“地利不辟，人满为患。河北诸省，岁虽中收，犹道仅相望。京师一冬，死者千计。一有水旱，道路不通，运赈无术，任其填委，十室九空。滨海小民，无所得食，逃至南洋，美洲诸地，鬻身为奴，犹被驱迫，丧斧以归，驯者转于沟壑，黠者流为盗贼。”

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把中国逐步推向了悲惨的生存空间。中国的处境犹如“以一羊处群虎之间，报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自上者乎？”但是，却“法蔽如此，虽敌国外患，晏然无闻”，当权的上层官僚集团仍然找不到救国救亡的有效良方，显得捉襟见肘，不知所措。封建士绅阶层和知识分子也是无能为力，闻战败割地赔款，虽拍案而起，义愤填膺，不久，即人潮消退。“上每及国耻，咎顿足流涕，常熟亦日言变法”，“此间大人先生两月以前尚颇有兴亡之志，今又束阁矣。此自国运，虽有大力，无如之

① 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版，第164页。

② 夏晓虹编：《论不变法之害》，见《梁启超文选》上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版，第6页。

何，奈何奈何！”^①中国究竟该向何处去呢？出路在哪里呢？

梁启超从“变通”的思想基础出发，吸取俄国、日本等国家振兴的经验，通过对当时中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分析，探究中国深层次的社会危机与矛盾，他指出中国之所以落后贫弱的根源：不图变法、不思维新！其表现“为不变之说也，犹曰守古守法，坐视其困循废弛，而漠然无所动于中”，其结果“沿积弊不能振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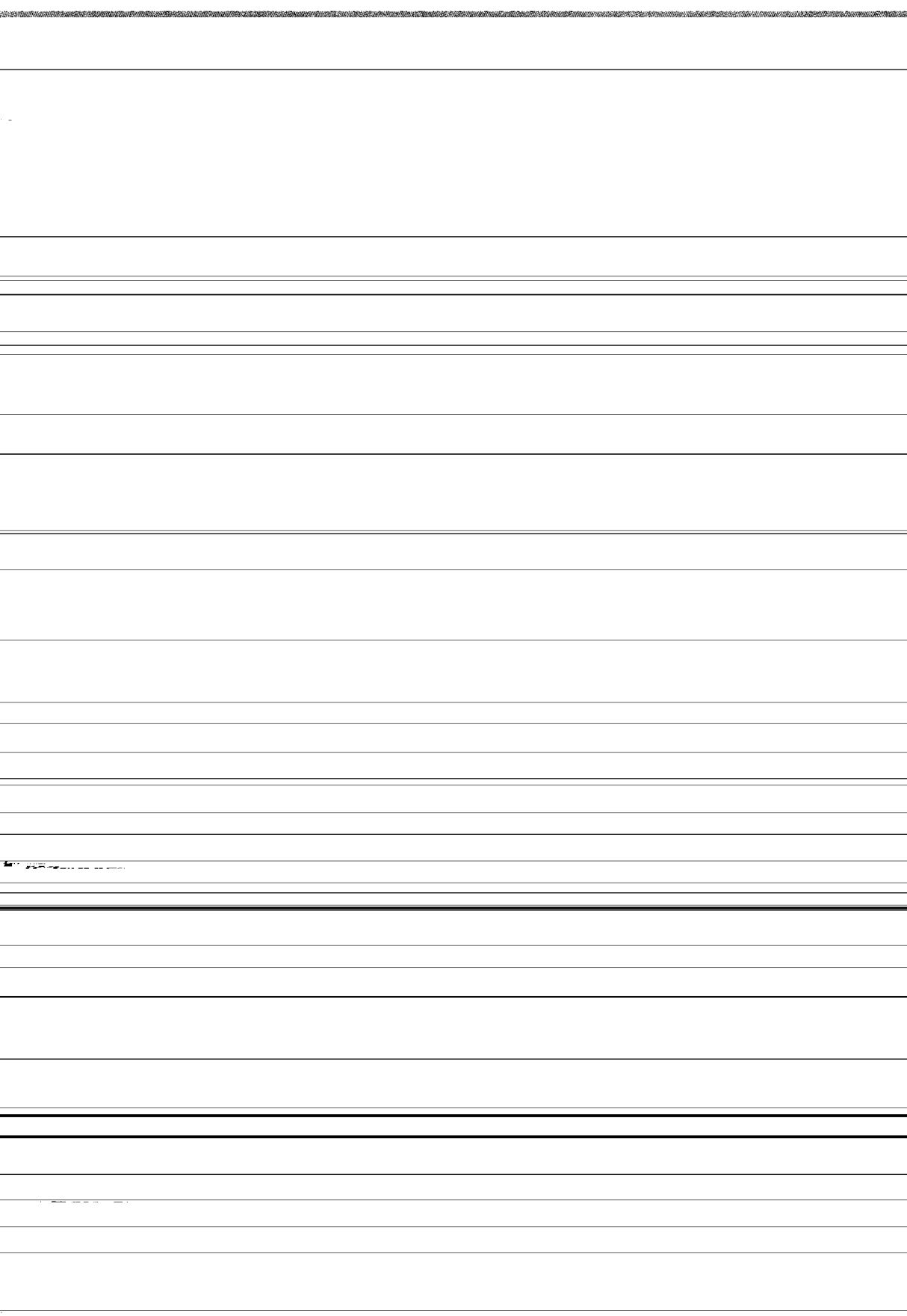
为什么不能主动变法更新呢？来自源于封建专制集权的治国理念和统治政策。即固守“祖宗之法”不变，墨守成规，因循守旧，不思改革之法，不图维新之道，满足于封闭保守的治国理政的理念，盲目骄傲自大，对世界大势茫然不知。代表性的观念是：“今日之法，匪今伊昔，五帝三王之所递擅，三祖八宗之所诒谋，累代率由，历有年所，必谓易道乃可为治，非所敢闻”^②。在这种思路指导下，中国只能在封闭束缚的环境下保持一个社会的所谓“长治久安”。但是，却造成了以下的弊端“但虞内忧，不患外辱，故防蔽之意多，而兴利之意少，怀安之念多，而虑危之念少。秦后至今，垂二千年，时局匪有大殊，故法治亦可不改”。在封建当局者的心目中，理想的大清帝国应该是这样的“图景”：“闭关画界，永绝外敌，终古为独立之国，则墨守斯法，世世仍之，稍加整顿，未尝不足以治天下”。但是，这种一相情愿的梦想，当遇到来自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的肆意攻击时，便马上化为泡影。对此，梁启超批评道：“所谓独立之国者，目未见大敌，侈然自尊，谓莫己若；又欺其民之驯弱而凌轹之，虑其民之才智而束缚之，积弱凌夷，日甚一日”。一旦遇到强敌入侵，封建帝国的虚弱本质立即暴露无遗。“与泰西诸国相遇也。……以此遇彼，犹以蔽痛当千钧之弩，故印度、突厥之覆辙，不绝于天壤也”^③。其根源在于，中国封建统治的核心，是以皇权为中心，乾纲独揽，以维护君权的至高无上和世袭继承为唯一目的，故而必然采取专制集权的统治方式，严刑峻法，漠视民权，镇压民众。

据此基础上，梁启超指出中国振兴的唯一出路，在于变法维新，以图自强。他说道：“要而论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阂制。变亦变，不变亦

① 丁文江、赵丰田著：《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版，第27页。

② 《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2008版，第4页。

③ 《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2008版，第4页。



想，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 救亡兴国的出路在于变法，变法的关键则“在育人才”

中国落后的关键，在于缺乏近代化的教育，缺乏新式思想的人才，这是梁启超最鲜明的一贯思想。而过去清政府的新政运动之所以失败，就是未能抓住“育人才”这一要素。梁启超指出“中兴以来，讲求洋务，三十余年，创行新政，不一而足，然屡见败衄，莫克振救”，“今之言变法者，其荦荦大端，必曰练兵也，开矿也，通商也”，这样的所谓变法，是不完全的，因为，唯独不讲求培养人才，追求近代科学原理，犯了舍本趋末、急功近利的错误。“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用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源，其在此乎？”^①他在明确告诫国人：“变法维新”的关键，不能“见物不见人”，不能仅重视物质层面的技术、设备的引进，而忽视教育层面的人才培养。他指出，中国虽办洋务新政几十年，却依然不能富国强兵，根源就在这里。“能制造器械，乃能致强，能制造货物，乃能致富；今日创新法，出新制，足以方驾彼族，衣被天下者，几何人矣？”^②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在于“今之言治国者，必曰仿效西法，力图富强，斯固然也。虽然，非其人莫能举也”。

2. 兴办学校是“育人才”的关键

梁启超认为，洋务新政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只图其表，不求其本，中国问题的真正解决应从根本上放弃固有的旧体制、旧制度。应首先从改革教育体制入手。梁启超写道，三十余年洋务新政“之言变者，非真能变也。即吾向者所谓补苴罅漏，弥缝蚁穴，飘摇一至，同归死亡。而于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③那么，“学校”的重要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它和“育人”之间有着一个什么关系呢？它和国家“自强”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梁启超从这两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

首先，要发展近代产业必须首先“兴教办学”。梁启超认为：所有洋务新政的背后，都有一个关系到“人”的素质能力培育的大问题。这个“人”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士人概念，他不是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封建士大夫，而是具有近代知识背景的新式人才。梁启超说道：“将率不由学校，

① 《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见《饮冰室合集》，文集1，第9页。

② 《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见《饮冰室合集》，文集1，第23页。

③ 《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见《饮冰室合集》，文集1，第8页。

能知兵乎？选兵不用医生，任意招募，半属流丐，体之羸壮所不知，识字与否所不计，能用命乎？……图学不兴，厄塞不知，能制胜乎？船械不能自造，仰息他人，能如志乎？……矿务学堂不兴，矿师乏绝，重金延聘西人，尚可可信，能尽地利乎？……商务学堂不立，罕明贸易之理，能保富乎？”^①这说明，梁启超已经认识到近代产业不是孤立的，学校教育是极为重要的条件。

近代军事、工业、商业的兴起必须要建立在近代教育基础之上，教育是一个国家走上近代化道路最基本的先决条件。比如，军事涉及测量学、地图学、工程学、机械学、医学等；工业涉及地质、采矿、交通、铁路等；商务涉及贸易学、经济学等。如果这些条件缺乏，仅购买一些武器装备就认为足以自强了，那是痴心梦想罢了。所以，梁启超说“如是则练兵如不练，如是则开矿如不开，如是则通商如不通”。归根结底，他强调兴办近代产业的前提条件，就是兴办学堂。兴学校，方能育人才；育人才，方能兴产业，即“农有农之士，商有商之士，兵有兵之士”^②。“故使一国之内，无一人不受教，无一人不知学”，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强大起来“举国之人，与国为体，填城溢野，无非人才”。所以，他得出“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的结论。以强化兴办学校的重要性。

其次，近代国家强盛的根源是“以智力取胜”。兴办学校，是“开民智”的必然选择。梁启超在《学校总论》中指出：“近百年间，欧罗巴之众，高加索之族，借制器以灭国，解通商以辟地，于是全球十九，归其统辖，智之强也，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也就是说，“自强”的含义，绝不仅仅练兵、开矿、铁路、通商之类，应当把“开民智”作为第一要义。那么，如何“开民智”呢？梁启超指出“智恶乎开？开于学。学恶乎立？立于教”，这是关系到民族生存的大问题。“亡而存之，废而存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于学校”^③。在这里，梁启超将国家存亡、民族兴衰、治愈愚昧、由弱趋强，全部归之教育的兴衰，可谓寄予深切厚望。接着，梁启超又提出学校的功能是大力培养掌握近代知识的专门人才，即“士”。这个“士”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聚千百帖括、卷折、考

① 《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见《饮冰室合集》，文集1，第9页。

② 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版，第21页。

③ 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版，第20页。